

关于《本草纲目》附图价值的讨论

谢 宗 万

《本草纲目》是我国明代伟大的医药学家和博物学家李时珍的巨著，他总结了十六世纪以前我国劳动人民防病治病的经验，在本草学上具有承先启后的作用。他对人类巨大的科学贡献是世人所公认和永世不能磨灭的。《本草纲目》自问世以来，先后刻印过几十个不同的版本，广受中外人士的重视。但就附图之异同而言，大抵存在如下三种不同系统的图版：

1. 明·万历21~24年(1593~1596)金陵胡承龙刊本(简称金陵本)，附图二卷。此为初版。由于现存正本太少，比较难见。江西夏良心版(1602)为该书之翻刻本，其附图均仿金陵本，在实质上保持了与金陵本的一致性。1975年人民卫生出版社校点本的附图即来源于江西本。

2. 明·崇祯13年(1640)古临钱蔚起重订刊本(武林钱衙藏版，简称钱本，为杭州版)，附图三卷。日本头注国译《本草纲目》之图即采自钱本。

3. 清·光绪11年(1885)合肥张绍棠味古斋重订刊本(简称张本)，附图三卷。1957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的附图即来源于张本。

对于上述三种不同系统版本的附图真伪问题，中外人士^{〔1-6〕}多有所评述。一般均认为以初版金陵本的附图为正，因其较能体现李时珍的原意，对考证明代用药品种有重要参考意义。

值得重视的是，日本汉方医药界和出版界在1979年由春阳堂影印了金陵胡承龙刊本的全部附图^{〔6〕}，显然这对不容易看到和得到金陵版正本的人是一件大好

事，该书同时还在下卷影印了张本全图，而且还附有三种版本附图页码的对照，对全面研究比较三种图版提供了便利条件。就在这部附图影印本的卷首，宫下三郎^{〔7〕}为该书写了解说，还印有单行本，对上述三个不同版本作了评述。

宫下三郎在解说^{〔6,7〕}中说道：“初版金陵本带有冠以其子姓名的附图两卷。从李时珍在正文中没有有一个地方谈到图，初版本为附图并非单个插图等来考虑，可能会想到附图是应书店的要求，其子孙根据《证类本草》图仓促制成的。李时珍与附图无关的说法，是渡边幸三早已提出的”。在宫下三郎“看了金陵本之后，则怀疑涣然冰释”。亦即肯定了渡边观点的正确性，他最后提出说“李时珍《本草纲目》的图”这种提法“毫无意义”等等，应当指出，此说颇值得商榷，故辨之如下。

若从金陵本上卷开头载有“阶文郎蓬溪知县男李建中辑”、“府学生李建元图”、“州学生孙李树宗校”三行及下卷载有“府学生男李建木图”、“州学生孙李树声校”来看，宫下认为附图是以其诸子中最有名望的李建中为主，由建元、建木绘图，其孙树宗、树声协助而成”。这种看法是有他一定依据的。但这是否就能充分说明所有附图与李时珍毫无关系呢？我个人认为，这涉及到《本草纲目》附图本身的价值问题，应该就其实质从多方面来分析：

(一) 关于金陵本《本草纲目》附图和《证类本草》^{〔8〕}插图异同的问题，

这是一个首先需要澄清的问题。笔者对此二书所

宁可有病不治，言词极为痛切。此节指出无病之人，不宜乱服药物，并提出“资食以存生”，以食疗来养生的思想，均十分可贵。

(三) “蜀椒。……仲景云：熬用之。”(《千金要方》)

按：蜀椒味辛而麻，气温以热，功能温中散寒，除湿止痛，杀虫解毒。《金匱要略》大建中汤即取蜀椒为主药，治腹满寒疝，心胸中大寒痛。升麻鳖甲汤则取蜀椒解毒止痛而治阴阳毒。《伤寒论》乌梅丸治鱿厥，则取蜀椒安鱿杀虫。可见仲景运用蜀椒之广。

《伤寒论》和《金匱要略》中，凡用蜀椒皆炒去汗。此节提出“熬用之”，熬，即炒也。推测仍是使椒去汗，汗乃椒之油，迨去之以增其药力欤？《重修政和证类本草》引陶宏景云：“凡用椒皆火微熬之，令汗出，谓之汗椒，令有势力”，可以参考。

由于张仲景之著作在汉时已佚，现在所流传的已是经王叔和等撰次整理，原貌已不可复辨，因而发掘整理研究仲景的遗文，对于进一步学习发扬仲景学说当具有一定的意义。

有附图,逐一地进行了全面的核对,结果如下:金陵本《本草纲目》^[9]附图1109幅(藤黄有名无图,未计入内),包括药物1129种(有一些图是一幅图内绘药二种,故药物种数多于图幅数)。其中1031种药物的图均为《本草纲目》自绘,并非抄自《证类本草》,此数占全书有图药物总数的91.3%;仅有98种药物的图与《证类本草》之图基本相似,或纵然相差较大,但仍能看出是从《证类》脱胎而来。此数占全书有图药物总数的8.7%。就在这98种药之中,常用中药只有41种,而其余57种则为(1)少用药;(2)在《纲目》中属于“有名未用”;(3)附录中收录的品种。在这些品种中,如水英、丽春草、坐拿草、紫堇、攀倒甎、石菖、见肿消、九牛草、建水草、天寿根、铁线草、阴地蕨、水甘草、鹅抱、百棱藤、金梭藤、崖棕、野猪尾、刺虎、石道遥草、百药祖、黄寮郎、黄花了、田麻、催风使、耆婆藤、瓜藤、独用藤、撮石合草、小儿群、胡堇草、紫背金盘、石垂、布里草、茆质汗、芥心草、百两金、山姜、独脚仙、苘麻、苦芥子等四十余种均来自《本草图经》本经外草类,文字内容也是从《图经》摘抄或略加修饰而来。其实,《证类》的这些有关品种也同样是来源于《图经》。

《本草纲目》作为一部大型综合性本草的代表作来说,它博采群书,即使原著者对其中少数品种无感性认识,但是为了争取品种齐全,因而对少数少用药物或当时有名未用者也一并兼收转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通过上述二书附图异同的比较,可知《纲目》极大数目的图与《证类》不同。而且处在那个时代,条件又是那样的简陋和艰苦,又无专业绘图人员的配合,要完成那样大的工作量,何况其中包括许多新增品种,如曼陀罗等,这些图,完全是第一手的材料,就很有价值。因此,笼统地说它根据《证类》仓促绘制而成的说法,是完全令人难以信服的。

(二) 关于金陵本《本草纲目》附图的质量问题:

笔者认为衡量本草图的质量,应该有两条标准,一是准确性,二是艺术性。二者之中,尤以准确性为首要,如果不准确,纵然艺术性再高,图形再美,也会失去它的真正价值。以《本草纲目》的三个不同版本而论,张本的图由于多数选自清代的《植物名实图考》,所以附图虽较金陵本为美,但由于搞了不少张冠李戴的图,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故对张本附图的批评甚多,理由也正是如此。金陵本附图,就绘图艺术性来衡量,是比较差的,看来不是由具有美术修养的人来绘制的。《证类》之图,来自《图经》。《图经》之图出自

多人之手,很可能是有当时美工人员参加的,因而绘图较美,自然评价也较高。但《证类》图也有它自身的问题。现在衡量《纲目》之图是否有价值,最主要的一条是图文是否和该书紧密结合的问题,兹举例叙述之如下:

1. 南烛:《证类》“江州南烛”之图为小蘗科植物南天竹 *Nandina domestica* Thunb.,此与苏颂所谓“叶类苦楝而小,凌冬不凋,冬生红子作穗”者相符。金陵本《纲目》南烛之图,旁书“乌饭叶”,为石南科植物乌饭树 *Vaccinium bracteatum* Thunb.,此与李时珍所云“叶似山矾,光滑而味酸涩,三月开小白花,结果如朴树子成簇,生青,九月熟则紫色,……寒食采其叶,渍水染饭,色青而光”者相吻合。以上二者,皆各有所依据。

2. 何首乌:《证类》之图,为藤本,叶为三出复叶,互生,很难判定是哪一种。金陵本《纲目》图虽简朴,但显然为藤本,叶互生,单叶,心形,花序腋生,根块状。看来与传统药用的蓼科何首乌 *Polygonum mutilorum* Thunb. 相符合。

3. 枫香:《证类》之图不及金陵本《纲目》之图真实。后者树干粗而直,叶掌状三裂,裂片卵状三角形,主脉三条;果序球形,周围刺状。这与李时珍所称“枫木枝干修耸,大连连数围,……其实成球,有柔刺”的描述相符合。其原植物为金缕梅科植物枫香 *Liquidambar formosana* Hance,完全正确。

4. 蒲黄与香蒲:由于药用部分不同,一用花粉,一用其草,《证类》分别为二药,图也是两幅。《本草纲目》鉴于其植物基源相同,则合为一条,图也精简为一幅。这两种不同的处理,均各有其理由。这里只是说明李时珍有他自己的观点,而《纲目》附图是与这种观点紧密配合,文图呼应的。

5. 番红花:从《纲目》释名“泊夫蓝、撒法郎”,可知此为“Saffron”的译音,原植物应为鸢尾科植物番红花 (*Crocus sativus* L.) 但李时珍在集解中说:“番红花出西番回回地面及天方国,即彼地红蓝花也。”这说明李时珍把番红花和红蓝花(菊科红花)的原植物混为一谈,所不同者仅仅是产地上的区别而已。这是文字上的错误,就附图来说,也同样把番红花错画成红蓝花。此是在错误方面也体现了图文的一致性。类此,番木鳖、五灵脂、龙骨等,图文也都错得一致。

通过上述的一些例子,不难看出:金陵本附图与《本草纲目》文字部分,无论是从正、误两方面来看,基本上是图文相应的,是能体现原书作者李时珍的原意的,对考证明代用药品种及《纲目》新增品种等是有重

要参考价值的。当然个别错误的存在, 对任何书来说都是难以避免的, 何况是如此大的一部巨著, 而且又有他所处时代的一些局限性和当时某些具体情况, 如进口药原植物的难见, 边远地区和深山老林所产药物的生物基源较难深入了解等等。因此, 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正确估价《纲目》附图的作用。用历史的眼光和以当时的学术水平来衡量, 都应该说是比较好的。现在仍然有它重要的科学价值。至于原版金陵本, 迄今保存下来的极少, 至为珍贵, 以个人管见, 这种善本, 可视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的图书。

(三) 关于李时珍本人与金陵本附图的关系问题,

李时珍 (1518~1593) 湖北蕲州 (今蕲春县) 人, 在他数十年的医药实践中, 实地考察药用植物, 解剖药用动物, 采掘和炼制矿物药, 以毕生的精力, 写作三十年, 稿凡三易, 终于写成了这部 190 万字的世界名著《本草纲目》。金陵第一版是在李时珍生前时就开刻了的, 亦即于明·万历 18 年 (1590) 由李时珍亲自主持而由胡承龙承担刻书任务的。从李时珍“进本草纲目疏” (1596) 中所述“甫及刻成, 忽值数旱”这两句话, 并结合金陵本无此“疏”而江西本则有之来分析, 可见《本草纲目》的刻成, 约在李时珍去世的 1593 年前后。这部不朽巨著, 从药物调查、资料整理、编写到完成出版, 都与李氏一家人和他学生与朋友的辛勤劳动及实地调查有关。从而使《纲目》新增品种达 374 种之多, 其中不少均属首次附图。如果不是有人当时写生, 或者采有药物标本, 后来按实物绘图的话, 那么新增的药图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而且又是如何能够做到图文一致? 不但新增的图如此, 就是老的药物品种, 有那么多种类与前人之图不同, 很难想像, 不是根据实物绘制, 而是光凭简单的文字记载就能在短时间内自行编造出来的。我深信《纲目》附图非李时珍本人亲手绘制而成, 这早在金陵本附图卷上题款上就说明清楚。何况写书与绘图各有分工, 已属惯例, 但编书的人要对附图的准确性负责, 亦属必然。否则, 附图就没有意义。李时珍是《纲目》的主编人, 凡于李时珍在世时所绘之图, 就不能说未经李时珍的认可。而在李时珍逝世之后, 其子所绘之图, 纵然李时珍不可能过目, 但其绘图所依据的实物如果是李时珍加以肯定过的, 是和文字描写相适应的东西, 也就不能从时间上机械地同李时珍截然分开。为此, 把金陵本附图说成与李时珍毫无关系的说法, 是没有从整体来看问题, 而只是从是否为李时珍本人亲自绘图这一点来作判断, 可以说这种看法是不够全面的。其影响所及当然也是不好的。

江西夏良心本在第一次翻刻时, 撤去原图, 卷上题款在卷之八金石部金类附图的那一页上, 按金陵本辑书姓氏的第一行写成: “勅封文林郎四川蓬溪县知县蕲州李时珍编辑”。按理说, 翻刻原书, 不应作任何更改, 可是江西本为什么要对题款作上述变动呢? 很可能与人们均公认李时珍主编该书有关。附图是全书的一个组成部分, 作为一个整体来看, 江西本为了避繁就简, 突出重点, 因而只写了李时珍编辑, 而未写他儿孙的名字。这样理解, 未尝不可。当然如此处理, 谁是绘图人, 隐晦不明, 不如维持原貌为佳。1975 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本草纲目》校点本⁽¹⁾在第一册附图之下, 则更简化为“明·李时珍编辑”。性质和江西本同。

总之, 金陵本《纲目》附图, 很有学术价值。没有李时珍, 就没有《本草纲目》, 没有《本草纲目》, 当然就不会有《纲目》附图。本文论证, 足以说明金陵本《纲目》附图与李时珍本人不是毫无关系, 而是密切相关。

参 考 文 献

- (1) 赵燏黄: 药学通报 3(8):354, 1955。
- (2) 黄胜白、陈重明: 植物分类学报 13(4):51, 1975。
- (3) 郭家林、郑金生: 中药通报 6(4):9, 1981。
- (4) 岡西为人: 本草概说, 232 页, 创元社, 1977。
- (5) 鲁桂珍: Am J Chim Med 4(3):209, 1976。
- (6) 本草纲目: 附图上卷 (金陵胡承龙刊本), (日本) 春阳堂, 1979。
- (7) 宮下三郎: 本草の图について——本草綱目附图の説として——见(6), 9~24 页, 并有单行本, 1979。(于文忠节译: 国外医学, 中医中药分册, 4(3):50, 1982)
- (8) 唐慎微原著: 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 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 1957。
- (9) 李时珍: 本草纲目, 金陵胡承龙刊本 (1593~1596)。
- (10) 李时珍: 本草纲目校点本 (第一至四册),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75~1981。

治鼻衄验方

河南省尉氏县大槐树学校

西 凤 程

药物及制法: 枯矾一味。(将生白矾若干, 置适当器皿中, 放火上加热。待器皿中白矾全部沸腾后, 即移离火源。取出枯矾研为细末, 贮瓶中备用。)

用法: 当鼻出血时, 取脱脂棉球 (大小以能塞住鼻孔为度) 蘸清水湿透, 再蘸枯矾末少许, 塞入鼻孔, 鼻衄即止。